

# 紅衛兵運動的喪鐘： 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

• 唐少傑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發生在北京清華大學的百日大武鬥，是文革期間北京地區規模最大、持續最久和意義最深的武鬥，它不僅成為文革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且影響到文革的進程以及紅衛兵運動的命運<sup>①</sup>。考察清華百日大武鬥，可以看到文革群眾運動內部派性鬥爭的特點及結局。

## 一 起 因

1967年4月，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分裂為兩個對立的群眾組織：井岡山兵團總部（團派）和414總部（4派）。兩派在一系列文革問題上針鋒相對，不可調和。1967年底，兩派開始一些小規模的武鬥衝突，互相襲擊對方的場所和綁架對方有關人員。1968年1月至4月，衝突不斷加劇。4月中旬，團派扣押4派重用的一些原清華幹部，造成「羅文李饒」案<sup>②</sup>。4月20日，4派綁架站在團派一邊的原清華幹部陶森作為報復，並決定4月23日在禮堂召開批陶大會。團派決定反擊，百日大武鬥由此開始。

團派之所以要發動大規模武鬥，主要在於：(1) 3月24日，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揪出後，團派急於把他們與4派掛鉤，鼓吹楊余傅的黑後台就是414的黑後台。團派頭目想方設法使中共中央直接過問清華問題。(2) 3月27日，北京大學以聶元梓為首的新北大公社挑起武鬥，戰勝其對立面——北大井岡山派。中共中央文革支持新北大公社，使聶一夥由武鬥前的不利地位轉變為武鬥後的有利地位。團派頭目想借用北大的經驗，通過決戰性的大武鬥，逼中共中央表態支持自己，從而一舉壓垮4派。(3) 4派抓走陶森「點燃」團派引爆大武鬥的導火索。

蒯大富指出，清華兩派鬥爭一年多未見分曉，最後解決總要伴隨大武鬥，先下手為強，誰早誰主動。他進一步講明：「只要我們挑起武鬥，擴大事態，就迫使中央表態，於我們更主動。」

4月21日零時，團派宣布在4派根據地之一及關押陶森的地處——科學館周圍實行宵禁，團派千名群眾還舉行了抗議示威。同日，團派數次召開武鬥會議，對是否包圍、攻打科學館並給其斷水斷電進行討論。蒯大富指出，清華兩派鬥爭一年多未見分曉，最後解決總要伴隨大武鬥，先下手為強，誰早誰主動。團派作戰部長聲稱，寧可傷亡500人，也要攻下科學館。儘管會上有人反對武鬥，但還是通過當晚包圍科學館的決議。會後，團派幾個分部群眾經過討論，拒絕執行此決議。4月22日，為抗議團派頭目和某些群眾的「軟弱」，團派廣播台及前哨廣播台「罷工」。同日，團派多次召開會議，統一在武鬥上的思想和步驟。在深夜舉行的總部擴大會議上，蒯大富分析形勢，講明利害，「只要我們挑起武鬥，擴大事態，就迫使中央表態，於我們更主動。」「清華的問題不只是清華的問題，非中央過問不能直接解決。」「沒有武衛就搞不了文攻。」「再不搞武鬥，革命幹部從此就要離開我們，戰士們也灰心喪氣，紛紛不幹了。」「我們的隊伍就要分裂、垮台。」會上，決定立即實施封鎖科學館、佔領禮堂的行動，成立6人組成的「文攻武衛指揮部」，並對有關頭目和隊伍做了分工、部署。為防止走漏風聲，在當夜零點左右派人佔領禮堂，從地下管道運進大批鋼管製成的長矛後，會議人員才得以離會。值此之際，團派做好了大武鬥出擊的充分準備。

## 二 過 程 (4.23-7.26)

4月23日凌晨，團派佔領禮堂後，又佔領新、舊水利館。清晨，團派保衛組發出封鎖禮堂區、指責4派向禮堂偷運480根長矛的1號通告。4派佔領舊電機館，並相繼佔領動農館、土建館、汽車樓。團派決定攻打舊電機館，這關係到兩派在禮堂區的勢力對比。從9時至15時，團派出動上百人攻佔了4派數十人守衛的舊電機館，雙方動用了石塊、瓦片、硫酸、長矛等，約有50人受傷。自即日起，兩派在幾天內各自加緊搶佔學生宿舍和教學樓等。4月24日至28日，兩派不斷衝砸對方的辦公場所，破壞對方的廣播設施，查抄對方一些教職員工的住所，加強斥責對方的宣傳攻勢，構建武鬥工事和修築路障等。25日晨，團派數百人進攻科學館；28日晨，團派200多人攻打8號樓，兩次均告失敗。27日，4派被俘人員姜文波從2號樓三樓關押點逃出，因被追趕而跳樓，頭部先觸地死亡。29日中午，團派200多人和四輛卡車去9飯廳搶糧，遭遇4派60多人攔截，雙方用長矛、石塊等激戰。團派一卡車朝4派隊伍衝去，當場壓死4派人員謝晉澄。

至4月底，清華已有60%的人員離校逃難。自4月底至大武鬥結束，兩派不斷從外地、外單位運進武器，並且大力試製、生產各種土武器，如土炮、土火箭、土炸彈、土手榴彈、長矛、燃燒瓶、彈弓車(強弩)、地雷、槍枝、匕首以及拖拉機改裝的土坦克和用汽車改裝的土裝甲車等。團派還成立了國防工業辦公室(「國防工辦」)，專門負責試製、生產專用於武鬥的武器。

5月上旬，團派攻佔材力館、土建館等地。4派攻佔工字廳等地，並摧毀團

至4月底，清華已有60%的人員離校逃難。自4月底至大武鬥結束，兩派不斷運進武器，並且大力生產土炮、土火箭、土炸彈、土手榴彈以及拖拉機改裝的土坦克和用汽車改裝的土裝甲車等。團派還成立了國防工業辦公室，專門負責試製、生產專用於武鬥的武器。

派的多處工事和路障，破壞團派佔領區的電話線路。雙方各有人員負傷和被俘。兩派各以多種方式表示絕不妥協的決心，如5月5日，4派上千人在天安門廣場抬着謝晉澄屍體舉行集會和遊行，表示一定向團派討還血債。5月10日，4派在動農館前再次舉行批鬥陶森大會。團派文攻武衛指揮部緊急命令，調動四輛土裝甲車和200多名武鬥人員衝擊會場，兩派均有許多人負傷。

5月中旬，4派佔領焊接館、工物系館和整個主樓等地，團派佔領9003大樓、綜合機械廠等地。兩派各出動上百人的隊伍向對方有關據點進攻，均告失敗。14日，4派人員孫華棟被團派人員綁架毒打後死亡，4派於26日抬着孫之屍體進城遊行示威。19日，4派綁架團派總部常委陳育延，6天後因陳疾病復發而釋放。大武鬥期間，團派聲稱4派組成暗殺團要暗殺蒯大富等人，4派指責團派試圖綁架或傷害外出的4派頭目。

到5月下旬，兩派繼續襲擊對方的據點或要塞。25、29日團派多次開會，商討並籌備以武鬥「紀念」1967年5月30日團派革委會流產一周年，以雪對4派扼殺該革委會成立之仇，確定以4派佔據的東區浴室為攻打目標。

從5月30日3時（一說3時30分）蒯大富在清華電廠拉斷總電閘作為進攻信號起，團派與4派激烈交戰，相持不下。到中午12時許，團派調集數百公斤汽油潑入浴室，塞入大量草墊子、木桌椅檯和乾辣椒，從內部燃起大火。消防隊5輛消防車趕來救火，被團派阻止。13時許，在團派燃起的大火以及喊話勸降下，4派守軍最終打着白旗下樓。

14時，4派總部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等人緊急報告，要求制止團派武鬥，營救被俘人員。深夜，5、12號樓的4派人員被迫撤至4派「中心根據地」——焊接館。至此，團派控制了清華80%的地盤。校內非武鬥人員紛紛離校。

5月30日團派攻佔東區浴室的大武鬥持續近11個小時，是百日大武鬥中兩派損失最大、傷亡最重的一次。團派投入300多人、亡2人；4派投入300餘人、亡1人；兩派共有200多人負傷。雖然東區浴室被攻克，但是僅有21人的4派守軍卻使團派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超出了此次大武鬥發動者的預想，並使得團派日後再也不敢向4派發動大進攻。

6月，儘管兩派基本上都處於武鬥「休整」階段，但是，在加強鼓動自己隊伍士氣的同時，兩派加緊了在城區許多公共場所和重要機關駐地進行抨擊對方的宣傳攻勢（如貼大標語），並多次造成兩派人員在城區不期而遇的毆打械鬥。兩派還不分晝夜地出動游擊人員，武裝偷襲或騷擾對方據點，破壞對方設施，等等。6月19日團派崗哨向8號樓開槍射擊，武鬥升級，進入槍戰階段。6月30日上午，8號樓的4派人員全部撤往科學館，與團派隊伍在禮堂東面相遇，雙方動用了手槍、手榴彈、長矛、石塊等。4派投擲的手榴彈炸傷團派近10人，4人重傷，其中一人腿被炸斷，另一人腸子被炸壞。團派總部遂決定武裝封鎖科學館，凡有出入者一律開槍射擊。4派總部宣布處於「一級備戰狀態」。

7月上旬，團派頭目針對下屬武鬥人員怕開槍打死人負責之事，多次聲明：「打死人由總部負責，不由個人負責。」團派武裝封鎖了4派與校外的唯一通

5月30日團派攻佔東區浴室的大武鬥持續近11個小時，是百日大武鬥中兩派損失最大、傷亡最重的一次。團派投入300多人、亡2人；4派投入300餘人、亡1人；兩派共有200多人負傷。

道——東門及周圍地區，並用試製的土迫擊炮轟擊科學館，未成功。7月4日、5日、6日團派一連三日開槍擊中4派人員朱育生、楊志軍、楊述立，三人相繼死亡。

7月7日16時，4派近百人在天安門前召開「呼救大會」，並抬着楊述立的屍體，在天安門、前門、北京市公安局和市革委會所在地以及使館區遊行，抗議團派暴行，向有關方面施加壓力。

7月9日8時30分左右，團派武鬥人員用大彈弓向科學館四樓（四樓基本上是木製結構）頂層上的廣播喇叭群支撐木架拋擲燃燒瓶，燃起大火。四樓北、南部先後燒塌，站在禮堂屋頂都感到火勢灼人。9時，設在科學館中的4派電台致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緊急呼救。9時許，蒯大富發表廣播聲明，敦促4派投降。團派廣播台喊話勸降20餘次，說大火是4派自己放的，是「新的國會縱火案」等。10時許，消防隊前來救火。經團派一番刁難、檢查後，12時多才進入科學館。團派限令，消防隊須在18時前撤離。消防隊撤離時又受到檢查，團派迅即重新封鎖科學館。

7月16日10時30分，4派從動農館掘往科學館的地道（未完工）被團派從掘進端處爆破炸毀。團派從炸塌處往地道內灌水、投手榴彈，俘獲一名4派施工人員。此次爆破使4派總部營救科學館的突圍計劃最終失敗。科學館內，兩具屍體無法運出，早已腐臭。20多名傷員傷口感染、惡化。100餘人在炎熱中，為防止槍擊中彈，只能擠在樓道內生活。20多天裏，未運進點滴食物和蔬菜。臨時掘的一小口水井，遠不夠使用。7月18日，錢平華從蘇州家中返京回校，因不知東門已被封鎖，從該門進入後，遭團派槍擊死亡。

進入7月後，北京市革委會針對許多高校武鬥嚴重，多次召開有關制止武鬥、宣傳並貫徹中共中央「7·3」布告（關於制止廣西省武鬥的布告）精神的有關會議，準備在中關村召開制止武鬥群眾大會和派遣宣傳隊在高校地區進行宣傳遊行。謝富治指示團派提交關於制止武鬥的方案，並向團派頭目打招呼可能要派工人遊行隊伍進清華宣傳。7月6日至25日，團派總部召開數次會議討論制止武鬥問題。團派一些頭目強調：「7·3」布告不適用於清華；團派與4派的武鬥有特殊性；團派必須用攻佔科學館的既定事實來求得武鬥後的優勢。團派總部向市革委會等有關方面提出停止武鬥的三個條件：由北京衛戍區正式逮捕4派核心人物及羅、文、李、饒等人；由北京衛戍區派部隊進校制止武鬥首先要拆除科學館工事；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和市革委會直接解決清華問題。團派對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會關於制止武鬥的指示並未予以足夠的重視，至少沒有做出應有的預測，更不用說做出切實的響應了。相反，6月下旬以來，勢力相對弱小的4派多次（最後一次是7月26日）要求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會派宣傳隊進駐清華，或對清華實行軍事管制，以求真正打破團派在清華的霸主地位，結束武鬥從而結束自己的整個武鬥的被動地位。儘管我們至今還不清楚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會特派宣傳隊開進清華的內幕，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制止清華曠日持久的大武鬥，表明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決心在北京眾多高校及至全國結束武鬥，並通過清華來樹立一個從外部依靠工人群眾結束武鬥的典型。顯然，自「5·30」大武鬥後，團派和4派基本上處於相持狀態。隨着全國性的武鬥形勢的

7月7日，4派近百人在天安門前召開「呼救大會」，並抬着楊述立的屍體，在天安門、前門、北京市公安局和市革委會所在地以及使館區遊行，抗議團派暴行，向有關方面施加壓力。

發展，清華的武鬥既不可能單純以清華人的意願來左右，也不可能是武鬥雙方所能根本解決的。

### 三 工宣隊攻佔清華園 (7.27)

7月26日17時30分至次日凌晨2時，北京市革委會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召開宣傳隊開進清華大學的動員大會。市革委會負責人和約有63個單位的負責人出席會議。

7月27日清晨，北京市61個單位3萬多工人組成的「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最初稱「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後稱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從各自單位出發，奉命開往兩派武鬥人員總共600多人的清華大學，進行制止武鬥、拆除工事、宣傳「7·3」布告等工作。該宣傳隊的領導實際上由中共中央警衛部隊(8341)在北京一些單位的軍代表擔任，他們負有特殊使命。約9時至10時，宣傳隊各路隊伍抵達清華南門、西門(主要隊伍在此)及東門。宣傳隊指揮部要求全部隊伍必須於11時開進清華校園。

團派對這突如其來、聲勢浩大的宣傳隊，事先毫無所知或準備，把數萬人的宣傳隊訛傳成10多萬，但他們十分明白，宣傳隊的開進意味着團派稱霸清華的結束。團派作戰部長帶隊帶武器趕至西門阻攔宣傳隊。後來，由南門等處先進來的宣傳隊開通西門，才使整個宣傳隊於中午時分進入清華園。宣傳隊下屬8個團按預先所定的計劃，差不多同時開赴各自任務所在的方位，以分片包幹而不是逐一推進的方式迅速完成了對兩派各據點的「分割」和「包圍」，發起宣傳、喊話攻勢，以眾多的人勢(整個宣傳隊與兩派武鬥人員之比約為50比1)，把遇到的武鬥人員團團圍住(實為扣住)，進行宣講工作。同時，宣傳隊開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鐵絲網、電網等。

11時30分，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電話通知蒯大富(因蒯不在，讓人轉告)：宣傳隊要開進清華，團派要大力支持宣傳隊。12時多，接到團派多處據點告急的消息，蒯在靜齋召開團派總部會議，決定：(1)緊急上告市革委會和中共中央；(2)命令各據點抵抗宣傳隊，必要時可使用武器。團派頭目已意識到團派到了生死關頭，通過電話以及派不易被識破的小孩穿過宣傳隊重重隊伍，把抵抗的命令傳達至團派各武鬥據點。14時多，蒯大富赴市革委會「告狀」，結果與市革委會負責人大吵一通，揚言團派「以死一拼」。晚飯後，在謝富治、吳德、宣傳隊代表與蒯參加的會議上，謝命令蒯：停止武鬥，拆除工事，上繳武器，撤出武鬥據點；並指示蒯與宣傳隊代表一起立即回清華實施上述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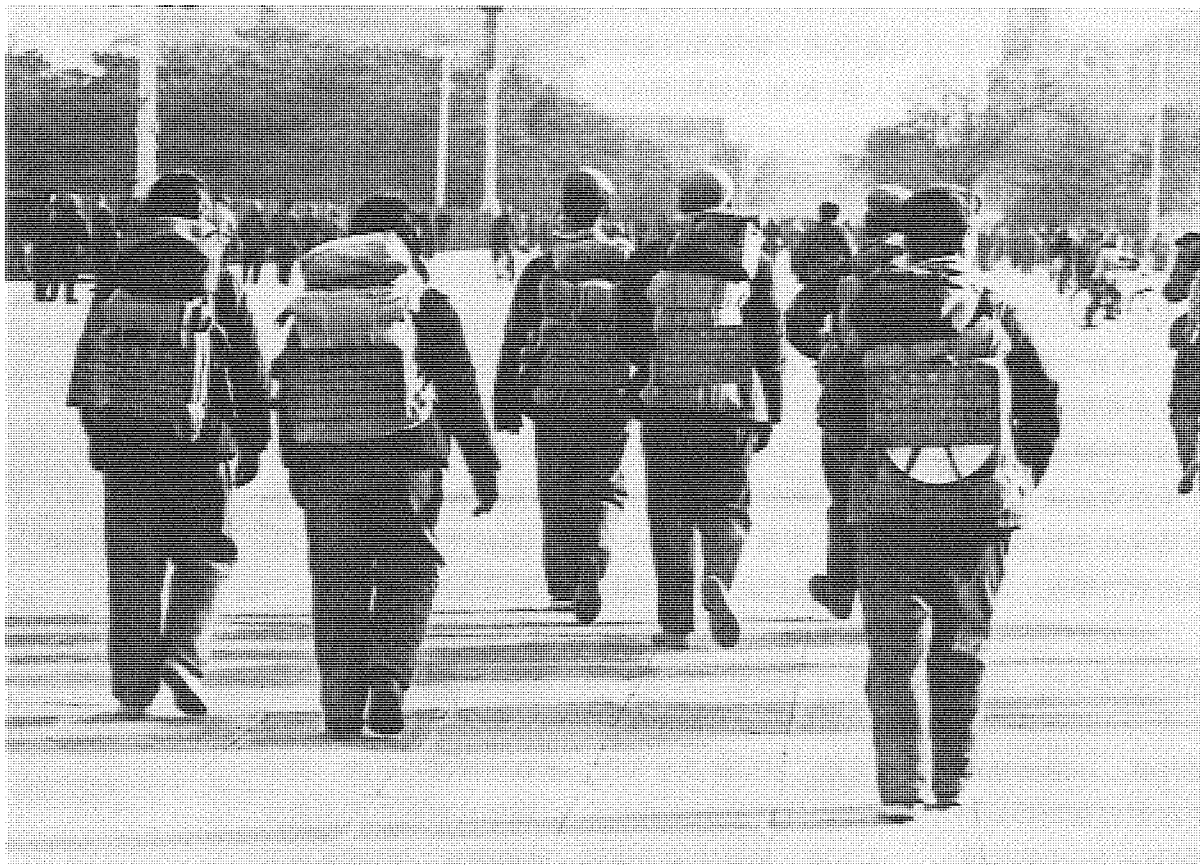
當日中午，宣傳隊進入科學館，查繳4派武器，館內人員全被帶出。宣傳隊抵近禮堂時，團派人員引爆電發地雷。經過談判，宣傳隊被允許進入禮堂，搜查出一些武器及武鬥工具。宣傳隊在電廠與團派對峙，團派頭目下令開啟電網電閘，以阻止宣傳隊進入電廠。自13時多至深夜，靜齋的團派用石塊、長矛等向靜齋後門的宣傳隊衝擊，使許多工人掉進荷花池(即朱自清先生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荷塘)，一天下來，用長矛和手榴彈，連刺帶炸，使100多名工

制止清華曠日持久的大武鬥，表明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決心在北京眾多高校及至全國結束武鬥，並通過清華來樹立一個從外部依靠工人群眾結束武鬥的典型。7月27日清晨，北京市61個單位3萬多工人組成的「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奉命開往清華大學。

1968年7月27日是團派與宣傳隊的大武鬥之日。在這一天的12個小時裏，宣傳隊有5人犧牲，731人負傷，其中重傷149人，輕傷582人，143人被抓。宣傳隊扣留了100多名團派人員。「7·27」大武鬥迅猛地震動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

人負傷。明齋的團派也負隅頑抗，造成130多名工人負傷。到下午5時多至6時，先後有王松林(北京第二機牀廠副科長)、張旭濤(北京541工廠工人)、潘志宏(北京市供電局工人)被團派用手榴彈炸死。一教樓等地的團派還各自為戰，頻頻對其周圍的宣傳隊出擊，又使一些工人負傷。7月27日近23時，靜齋的團派前往9003大樓增援，用長矛刺死在三樓一房間小息的韓忠現(北京第一食品廠工人)，約10分鐘後，又開槍打死李文元(北京橡膠四廠工人)。9003大樓外實際上有數千名工人圍樓。該樓的團派一直到7月30日才被迫由解放軍「保護」撤出，這也是百日大武鬥的最後一個據點。

約20時，與宣傳隊代表一起返回清華的蒯大富被帶至清華園中學一教室，與宣傳隊主要指揮、北京新華印刷廠革委會主任、軍代表遲群等人商討停止武鬥之事，經過爭吵，達成四項協議：停止武鬥，拆除工事，上繳武器，撤出武鬥據點。雙方約在22時45分簽字後，蒯與5名工人代表、1名軍代表前往明齋團派廣播台落實廣播上述協議。蒯把代表們擱置一旁，在另一房間召開團派頭目及有關人員30多人參加的會議。蒯先講了形勢的嚴峻，又講了與工人對抗下去的兩種危險：一是全力攻打工人會因工人的死傷大大增加而置團派於死地，另一是團派被工人打得全軍覆沒；他最後建議：為保存勢力以圖東山再起，團派必須全部撤離清華，並希望得到中共中央上層的解救。經過兩小時多的激烈爭吵，儘管有人提出拉隊伍去京郊山區打游擊，但會議還是決定在7月28日凌晨2時30分前，團派全部人員攜帶武器撤離清華(實際上，團派幾個武鬥指揮和個別據點並未撤離)。



團派頭目及武門的大批人馬撤至北京航空學院，企圖留給宣傳隊一個難以待下去的「空校」。團派另一支數十人的隊伍乘車撤往昌平縣內的清華核能研究單位200號，因司機數日未眠，駕車睡着，凌晨4時左右行至沙河附近，車翻入路旁稻田。一團派人員上車時把攜帶的手榴彈環拉出，以防外人截車。車翻時，手榴彈引爆，炸死2人，炸傷5人。

1968年7月27日不是團派與4派，而是團派與宣傳隊的大武鬥之日。在這一天的12個小時(正午至子夜)裏，宣傳隊有5人犧牲，731人負傷，其中重傷149人(軍代表10人，工人139人)，輕傷582人(軍代表30人，工人552人)，143人被抓(軍代表34人，工人109人)。宣傳隊扣留了100多名團派人員。4派據點幾乎是全部向宣傳隊敞開，不存在4派與宣傳隊為敵的問題。「7·27」大武鬥迅猛地震動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

#### 四 毛澤東召見五大領袖(7.28)

7月28日5時30分，蒯大富在郵電大樓致電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以及中共中央文革、中央軍委：「7·27在黑手晝夜策劃下假借宣傳七三布告挑動11萬不明真相的工人攜帶凶器突然包圍洗劫清華園，我井岡山戰士數百人遭毒打，數千人被捕未救。為避免跟工人再發生衝突，我井岡山戰士全部撤出清華。衣食無着、生命安全無保證，清華井岡山生命垂危、形勢萬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尋求中央馬上接見。」蒯剛返回北航，北京市革委會來電通知他參加毛澤東等人的召見，蒯接此通知懷疑此事，擔心被「黑手」陷害，後由聶元梓親自通話，才前去人民大會堂。

7月28日3時30分至8時30分，毛澤東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這是毛澤東在文革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召見紅衛兵代表談話。蒯到會時已近7時，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已匯報完畢。雖然我們至今還不清楚此次召見談話的全部，但根據同日正式發表的、由五大領袖署名整理出的〈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中<sup>③</sup>，可以看出：(1) 以清華百日大武鬥特別是「7·27」大武鬥為契機，毛澤東對紅衛兵領袖的嚴厲批評表明他對紅衛兵運動失去信心，對紅衛兵組織及其領袖已不抱希望。(2) 毛澤東決心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國結束武鬥。為達此目的，他既要醞釀淘汰文革初期效過犬馬之勞的紅衛兵領袖，又威脅說不惜動用正規軍武力來結束武鬥。他本人不但被全國性的群眾武鬥所困擾、煩惱，而且還要窮於應付這種武鬥。(3) 毛澤東對群眾武鬥所帶來的教育界文革如何搞下去的四個辦法表明，他開始考慮把現有的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從整體上列入文革的對象。這一點在他8月的一系列指示中得以體現。(4) 毛澤東明確告知紅衛兵領袖們，派遣宣傳隊是他的決定，不容懷疑或否定，更不容抵抗。在召見之後，蒯大富在很小的範圍傳達，毛講：「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嗎？這個黑手就是我，他也不來抓。」這對團派以武力抵抗宣傳隊進校不啻是致命的評判。(5) 一貫最善於捉摸毛澤東心理的林彪，給這次召

7月28日3時30分至8時30分，毛澤東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這是毛澤東在文革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召見紅衛兵代表談話。毛澤東明確告知紅衛兵領袖們，他不惜動用正規軍武力來結束武鬥。派遣宣傳隊是他的決定。毛講：「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嗎？這個黑手就是我。」

見以及紅衛兵領袖的「錯誤」畫龍點睛：「你們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個時期需要幹甚麼。」④紅衛兵領袖的「落伍」意味着紅衛兵運動的衰落。

7月29日至31日，「逃難」於北航紅旗戰鬥隊場地的團派多次召開總部擴大會議以及群眾骨幹會議。蒯大富數次有選擇地傳達毛澤東的召見講話，力圖把毛的講話置於有利於團派而不利於4派的程度，力圖多給團派群眾一些穩定情緒的信息。在這些會上，大多數團派人員的舉動反映出團派徹底消亡前的心態。在有的會議上，還貼出「留得井岡豪氣在，三年歸報劉鄧仇」，「雪裏梅花開不敗，井岡山人敢上斷頭台」的大標語。迫於有關當局的多方壓力和督促，團派人員於8月2日開始返回清華。同日，北京市革委會領導人通知團派頭目：宣傳隊要在清華駐下去。自8月中旬起，包括團派在內的清華人員開始「接受」宣傳隊的領導和改造。

## 五 武鬥的性質及影響

「武鬥」作為文革特有的現象和事實，它既不能只用軍事領域的戰爭、戰役和戰鬥去界定，也不能從宗教戰爭的角度去理解。「武鬥」是指文革中，在同一社會制度、同一信仰體系甚至是在同一價值規範的條件下，並且更多的是在同一地區、同一單位或部門中，某一群眾組織從政治上和精神上跟敵對群眾組織進行的武力鬥爭，也就是說，它是具有強烈派性色彩的群眾組織之間的武力鬥爭。在文革初期特定的歷史下，由於中共黨的領導和權威大大削弱，眾多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崛起，使處於不同階層、具有不同利益和為了不同目的的群眾，在形成了自己組織暫時的合法性和相對的權威性之際，面臨着如何對待或超越其他群眾組織的問題。而哪一群眾組織具有正統性乃至最高權威性，這既不能脫離黨的制約的軌道，又不能通過當代民主政治的程序來加以抉擇或運作，而只能通過群眾中間自覺或自發的武力鬥爭來爭取，但沒有任何一個群眾組織達到了自己的目標。因為，武鬥的進程和結局往往不是由武鬥雙方的群眾所左右的，而是由上級當局及其指使下的外來群眾來仲裁，並進而收拾其殘局。武鬥中通行的格局是武鬥雙方各為一端，而上級當局又為一端。這種格局表明：不管文革的群眾組織及其武鬥對於當前社會秩序產生多麼大的離心力，它們最終會被高度政治化了的文化制度所化解；進而還表明：儘管武鬥的主角是由群眾擔當的，但群眾在武鬥乃至整個文革中的命運卻不是自主的。

百日大武鬥提出的問題是：文革的群眾運動為甚麼只能由群眾的武鬥來收場？為甚麼對立的群眾組織只能以武鬥的兩敗俱傷或兩敗皆亡為自己的歸宿？可以說，這些問題既有它們生長所需的政治專制的土壤，也有它們一時「泛濫」所需的文化獨斷以及從思想到言行絕對排斥異己的傳統背景，更有它們天然的趨向暴力的本性，但是，決定這些問題的根源依然是群眾中間不同的利益、要求和目的。這些非常不同甚至尖銳對立的利益、要求和目的，使得文革既不是一場純粹的意識形態的革命，也不是一場改換各級官員職權的政治變革。結合清華大學文革的特點來看，青年學生是其領導和群眾的主幹。這些狂熱反對舊

百日大武鬥使毛澤東看到，已不能依靠激進群眾來完成教育界文革的任務。從1968年8月起，曾為文革先鋒的紅衛兵青年學生變為文革的對象，變為下農村、去農場接受「再教育」的群體。



權威的青年學生，造反之後還未來得及確立自己的權威，就由自己運動的分裂而走向武鬥。當時，團派主要是由出身相當低下、文革前本人或家人經歷坎坷或急於想在文革中改善自己地位的激進群眾構成；而4派主要是由原清華幹部所影響和作用的、或文革前本人或家人處境較佳的相對保守的群眾構成，對於文革的許多方面有所疑慮。兩派的群眾基礎或群眾成分是如此的不同，他們就必然對清華的文革之發展帶來截然不同的作用，亦必定把打倒對方作為建立自己權威的首要條件，甚至愈到後期，同對方的鬥爭愈益成為關繫着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同時，兩派都沒有料到武鬥的悲慘結局，沒有從武鬥的殘酷程度中意識到武鬥註定包含的自我否定、自我滅亡的因素。百日大武鬥致使18人死亡，1,100餘人負傷，30多人終身殘疾，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折合當時人民幣上千萬元。從當時的角度講，由於宣傳隊的介入，百日大武鬥使得4派不勝而「勝」，使得團派不敗而「敗」。從歷史的角度講，兩派在百日大武鬥中沒有勝負或不分勝負，在清華兩派的武鬥中，利益對利益的戰鬥、要求與要求的抗衡、目的同目的的衝突，使當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及口號總是處於次要的、唯己所需地加以實用的狀態，使有關的政令法規總是陷於尷尬無為的境界。

百日大武鬥給教育界文革帶來了決定性的轉折。毛澤東看到，已不能依靠教育界的激進群眾來完成教育界文革的任務，同時，他更加感到，教育界文革的對象已遠遠不是1949年前學成和1966年前學成的知識份子以及「走資派」。通過清華大學這個典型，毛澤東在8月以多種方式來表明「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門、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sup>⑤</sup>。8月5日，毛澤東批發中共中央通知中說：「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已到」<sup>⑥</sup>，中共中央領導層力圖把教育界文革納入自己的而不具教育界人士的軌道。8月26日，姚文元著文〈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對毛澤東改變教育界文革的戰略作了闡述<sup>⑦</sup>：

單靠學生、知識份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凡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佔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份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這種知識份子在當時主要指紅衛兵青年學生。從1968年8月起，曾為文革先鋒的紅衛兵青年學生變為文革的對象，變為與以前的知識份子一起接受改造和以下農村、去農場等途徑接受「再教育」的群體。

以百日大武鬥結束為標誌，文革的群眾運動走向全面低潮，直至消解。

百日大武鬥之後，文革的重心或主角已由廣大群眾及其代表——紅衛兵青年學生轉向中共黨的幹部及管理人員。造反派組織及其個人的整體上的衰

以「造反」為其真諦的紅衛兵運動在1968年夏末秋初拉下了難盡評說的帷幕。蒯大富總結發言：全國造反派看我們，我們的老本吃光了，全國紅衛兵跟着我們，跟着我們倒臺。我、韓愛晶垮台是小事，全國紅衛兵也跟着我們垮台。

落，群眾運動由對外造反起家到對內武鬥結束的命運，原黨的幹部及管理人員逐步而又勢不可擋地重新佔據原有的職權，這些都表明：文革初期的群眾組織已經「過時」，群眾運動的方法已經「陳舊」。毛澤東在1968年之後不再「啟用」群眾運動，他在1973年批林批孔和1976年反鄧鬥爭中，多次強調不搞群眾運動，因為他再也不想使群眾從自己的手中「失控」。以1968年夏秋為界，中共中央領導層實際上「告別」了群眾運動。

以百日大武鬥為界標，始源於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運動，經歷了一個兩年多的歷史怪圈後，在回歸清華大學本科生紅衛兵的內戰中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以「造反」為其真諦的紅衛兵運動之歷史劇目在1968年夏末秋初拉下了難盡評說的帷幕。蒯大富在1968年8月16日團派總部擴大會議（差不多是團派總部最後一次會議）上做總結發言：「希望大家要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全國造反派看我們，全國紅衛兵看我們，我們的老本吃光了，全國紅衛兵跟着我們吃老本，跟着我們倒霉。」全國的紅衛兵，北京的紅衛兵代表性強，北京的紅衛兵也就是大學的這五家。比較起來，北大不行，師大不行，地質還好，就數北航紅旗和清華井岡山代表性強」，其中，「清華影響最大。」「我、韓愛晶垮台是小事，全國紅衛兵也跟着我們垮台。」是的，百日大武鬥敲響了紅衛兵運動的喪鐘！

#### 註譯

① 60-70年代被稱為「美國友好人士」的韓丁(William Hinton)撰寫的 *Hundred Day War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只是一部對幾個普通當事人的談話紀實，對於了解清華百日大武鬥雖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② 參見筆者著：〈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興衰〉，載《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總第30期，1995.8。

③④⑤⑥⑦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北京：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頁153-54；154；162-63；161；163-64。

唐少傑 山東濟南人，1959年生。現任北京清華大學副教授。